

· 院校研究 ·

我国院校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前景

张 应 强^①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我国近十余年来的院校研究, 主要经历了“对院校研究的研究”和“开展中国的院校研究”两个阶段, 在实现院校研究的“中国化”改造、建设院校研究案例库、开展专题院校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 我国院校研究还面临诸多具体问题和困难。随着我国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步伐, 院校研究将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并在进一步促进院校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院校研究; 院校发展; 现代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7; 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1)12-0040-06

The Progress, Problem and Prospect of China Institutional Research

ZHANG Ying-q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wo periods are divid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stitutional research, which are the period of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the period of launching China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mportant progress is achieved in the aspect of realizing localized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constructing the case bank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 specific topics. Nowadays, there're some particular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ou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With the progress in acceler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there's much development space i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it will play bigger part in advancing the institu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① 收稿日期: 2011-10-22

作者简介: 张应强(1964—), 男, 湖北天门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一、我国院校研究的起源与进展

我国高等教育界对院校研究的认识,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当时就有学者开始介绍国外主要是美国的院校研究概况。^[1]1993 年 5 月潘懋元教授受邀参加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IR)第 33 届年会。会后,潘懋元教授在《外国高等教育资料》上发表了会议观感,介绍了会议的有关情况。但院校研究在我国正式兴起的标志,是 2000 年 3 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

该研究中心的建立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向的一种判断,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大众化、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逐步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办学资源配置由行政性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变;随着大学办学自主权下放,院校的发展竞争和多样化发展不可避免。这就必然要求院校加强对自身的研究,提高院校管理和决策科学化水平,解决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促使学校更快发展。十多年后的情况,印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我国的院校研究虽然只有十余年历史,但却是一个备受关注、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依据其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研究什么是院校研究的阶段,二是做中国的院校研究的阶段。

1. 第一阶段主要围绕“什么是院校研究”展开

院校研究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概念。在此之前,我国学者对院校研究并不熟悉。因此,我国学者特别是引进者对什么是院校研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有:院校研究的性质和特征、院校研究的研究内容、院校研究的基本方法、怎样建设院校分析数据库、如何组织开展院校研究等基本问题。同时,为了推进院校研究在中国的开展,还研究了院校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与高等学校管理研究的关系、院校研究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工作职责、哪些人参与院校研究等问题。在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美国院校研究的介绍成为一个重点。一是对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进展、研究方法、院校数据库建设的系统介绍;二是邀请美国院校研究学会的专家学者来介绍;三是通过选择性翻译美国《院校研究新方向》丛书中的有关著作进行介绍。通过系统介绍和研究,我国学者对院校研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共识。

——院校研究的目的是提高院校管理和决策科学化水平,促进院校管理工作改进。

——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

——院校研究的特征是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改进学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院校研究的职能包括基本职能和高级职能。基本职能是搜集本校及其相关环境数据,将数据描述成有用信息,作为决策参考或对外发布。高级职能主要指进行专题研究,包括学校运行中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分析、教学活动及其他项目的评估、学校各种发展规划的前期论证等。^[2]

——院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基于院校数据库的定量研究,还需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管理咨询方法、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

2. 第二阶段是“做中国的院校研究”

在进行了对美国院校研究的介绍以及对院校研究的研究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进入院校研究的高级阶段——“做中国的院校研究”。

(1) 实现院校研究的“中国化”改造。

做中国的院校研究,首先是对国际通行的院校研究模式进行改造,使其“中国化”,主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准确定位院校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最近 30 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非常发达,在推进院校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面临已经有了高等教育研究是否还需要院校研究这样的疑问。因此,搞清楚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对于推进院校研究非常重要。院校研究属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但与高等教育研究又有着诸多不同,有些方面甚至有根本性差异,这些差异可用下表表示。

表 1 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差异

项目	院校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研究目的	提出和解决院校实际问题	建立和发展学科理论
研究取向	以院校问题为中心	以学科理论为中心
研究对象	个体院校	共性理论
研究性质	院校层面的微观研究	学科层面的宏观研究
基本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多学科研究
成果形式	咨询报告和方案	学术理论和论文
主体研究人员	实际工作者	学科工作者
研究人员归宿	具体院校	院校和学科

二是考虑中国院校管理甚至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的特殊性。和美国的院校不同,中国院校长期运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对院校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院校实际上具有政府附属机构的性质,其内部治理结构主要以行政职能部门为主导,具有一定的科层制特点。另外,美国的院校研究是院校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和院校竞争而采取的自觉行为,是院校必不可少的常态工作。中国的院校研究的开展则不同,还需要从外部推动,需要号召和鼓动,使院校特别是院校的“两个一把手”重视院校研究,从而逐步转化为院校的自觉行动,成为学校管理的常态工作。

中国院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对院校研究进行中国化改造,以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有些特殊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院校研究能否推进下去。比如,中国院校内部的职能部门对学校的部门工作具有研究、咨询、决策和实施的职能,而且它们掌握着学校部门工作的基础数据和状态数据,院校研究部门如何处理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为了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院校研究往往要找出学校某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这就很容易使有关职能部门误解为对其工作的负面评价,从而产生反感情绪而阻扰院校研究的开展。院校研究机构本来属于基于科学研究的咨询机构,但在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行政化运行状况下,不赋予其部分行政职能就不利于院校研究工作的开展;而赋予部分行政职能又会改变院校研究机构的性质,使其研究工作丧失科学性和中立性。诸如此类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院校研究的中国化才能逐步解决。

三是适当拓展院校研究的问题域。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是院校研究人员对自己所在学校的研究。院校研究可不可以研究其他院校?可不可以研究院校的一些共性问题?对此,中国院校研究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研究过程中适当拓展了院校研究领域。院校研究从根本上来讲是立足本校,研究本校问题,为提升本校管理和决策科学化水平服务的。但研究本校问题,有时必须进行同类同型学校的研究,看看其他院校是怎样在进行改革以应对挑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方案可供借鉴。有时还需要研究整个高等教育问题和发展趋势,甚至国际高等教育问题和趋势。在院校研究过程中,有时是要借鉴国际经验的,特别是要借鉴发达国家大学的经验,因为很多问题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面对过、经历过,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院校研究不仅不排除对院校共性问题的研究,而且从提高院校研

究水平角度讲,还迫切需要这种共性问题研究。

(2) 建设院校研究案例库。

院校研究是院校的自我研究,各个院校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其问题解决策略也都带有院校各自的特点。因此,建设院校研究案例库成为院校研究必备的工作。案例库的建设可以提供院校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从具体学校的案例中得到启发。案例库也是院校研究教学、培训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为此,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以出版《中国院校研究案例》丛书形式,建立院校研究案例库。目前,《中国院校研究案例》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分别于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出版。其中一些典型案例,不仅反映了有关院校的改革探索成果,而且对其他大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受到院校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读者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今后,院校研究案例的征集、评价和收录工作将在更加突出具体性、专题性、典型性和成熟性方面予以加强。

(3) 开展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

如果说建设院校研究案例库是基于院校的个性特征的话,那么,专题研究则更多考虑了院校和院校研究中的共性问题。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同时并举,使院校研究内容更加丰富,院校研究成果的启发性和参考性更强。中国院校研究进入专题研究阶段始于2007年,但在短短的4年间,院校研究人员已经创设了几个由部分学校共同参与的全国性或地区性专题研究。如清华大学组织的NSSE研究、厦门大学组织的大学新生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北京大学组织的北京地区学生学习积极性研究,等等。专题研究将院校研究具体化,便于组织多院校研究力量开展合作研究,是对院校研究传统领域的拓展,是中国院校研究工作者的一种创新。今后的专题研究还需要在专题的选择和确定上加强合作与协同,同时要细化专题,避免专题泛化。

二、华中科技大学开展的院校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院校研究的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其院校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国倡导和推动院校研究,二是积极开展针对华中科技大学的院校研究。^[3]

1. 在全国倡导和推动院校研究

第一,率先在全国大学中建立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我们根据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形势,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必将推进和落实到院校层面。随着办学自主权逐步下放,办学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逐步形成,高等院校之间的发展竞争时代即将到来。院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必然要求建立在院校研究的基础上,开展院校研究是主动适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和趋势的重要举措。同时,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本身就具有类似于院校研究的基础,开展院校研究,是继承传统、打造高等教育学科特色和优势的重要举措。根据这种认识和判断,我们于2000年初正式向学校申请建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学校于2000年3月发文正式批复建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5年获批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二,通过学术研讨会倡导和推进院校研究。2003年10月我们举办了首次全国院校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目前已累计召开了9次学术研讨会,其中有4次国际学术会议,明年将召开第五次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学术研讨会方式,鼓动和推进全国高校开展院校研究,吸收更多研究力量参与院校研究,把院校研究推向全国。事实证明,学术研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次研讨会都吸引了诸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和院校的相关部门领导参与,加深了对院校研究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我们还通过基地的辐射作用推动院校研究。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在获批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自筹经费30多万元,面向湖北省高校公开招标院校研究项目,推动相关高校开展院校研究工作。

第三,领头组建院校研究全国性学术组织。2003年初,我院就开始酝酿建立院校研究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并于同年10月在甘肃天水召开的全国首届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启动了筹备工作。2007年我院带头申请建立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获得民政部批准,我院刘献君教授当选为首届理事会会长。院校研究分会的建立,在中国院校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推动全国的院校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编写院校研究教材、培训研究人员、设立学科方向培养研究生、开办期刊或专栏等。为了培养院校研究方向研究生以及培训全国院校研究人员,刘献君教授主持编写了《院校研究》教材,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参考教材。院校研究中心开办了多期院校研究培训班,培训院校研究人员;开设院校研究研

究生培养方向以及相应课程,培养院校研究后备研究人员。在《高等教育研究》等8份学术期刊上开办了院校研究专栏,并采取以书代刊方式连续出版《中国院校研究案例》,发表院校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典型案例。

第五,开展院校管理咨询,推广院校研究新成果。10余年来,我院部分教师以学校发展战略规划为突破口,先后应邀到40余所大学,和这些学校的领导、院校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和制定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同时结合其发展实际,面向中层以上干部和部分教师作学术报告。目前,累计已对全国300余所大学进行了管理咨询工作,对这些学校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受到有关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有些高校领导在办学中遇到问题,首先就会想到来我院请教和商讨。

2. 开展针对本校的院校研究

针对本校开展院校研究,既是把院校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案例,提高院校研究水平的需要,也是服务学校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从研究课题的来源来看,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成学校领导指定的研究课题,积极发挥咨询作用。《华中科技大学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总体规划(2010—2020年)》、《华中科技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2010—2020年)》的调查、分析、文本撰写工作主要是由教科院完成的。此外还完成了《华中科技大学学科发展状况研究》、《大学排行榜上的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型比较研究》等重要课题。对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愿景、目标确立、现实差距、改革对策,以及管理模式、体制机制创新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二是从学校职能部门工作中获取研究课题。学校职能部门是学校具体工作的管理部门,他们在相关制度设计、政策制定、过程管理中往往会碰到诸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动与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展座谈,共同商量和提出研究课题,开展研究。如在2006年7月的座谈会上,科研处提出了学校跨学科科研团队建设方面的问题,中心组织了由有关教师和博士生组成的相应课题组,深入学校12个跨学科科研团队开展调研工作。课题组反复研讨,撰写了跨学科科研组织的有效管理研究报告,总结了各类型跨学科科研团队的特点,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促进我校跨学科科研团队建设起到了较好作用。中心还针对人事处提出的高校人事人才工作战略研究课题,组织部分教师和博士生开展研究并撰写了研究报告。

三是根据中心研究人员对学校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判断,提出研究课题,主动开展研究。如我们开展了华中科技大学发展状况研究、校院两级人事分权研究、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运行状态研究、教师收入分配研究、机关工作作风调查研究、大学生课堂纪律调查研究、学生组织管理模式研究等。这些研究报告,大多经学校领导批示,转有关部门参阅并改进管理工作。我们还举办了《院校决策参考》简报,广泛收集国内外大学改革发展动态和经验,供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参阅。

三、在解决问题中进一步开拓 院校研究新局面

从根本上说,院校研究的生存环境,是大学外部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机制和大学自主办学。如前所述,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十余年前作出在中国引进和发展院校研究的决定,是基于对中国院校研究发展环境变化趋势的一种判断。十余年来,中国院校研究的生存环境逐步在向预测的方向转变,因此,我们才取得了上述进展和成绩。同时,也正是因为相关环境因素还处于转变过程中,目前我国的院校研究还面临着以下具体问题和困难:

第一,院校管理还没有实行问责管理和民主管理。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大学的内部管理和决策,不仅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有待提高,而且基本上是一种无风险决策,还没有建立重大决策的制度约束体系,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使得院校决策失误的成本很低甚至是零成本。因此,个人决策、经验决策、随意决策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抽掉了院校研究的必要性基础,阻碍了院校研究的开展。

第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进展缓慢。目前我国院校内部的行政职能部门权力过大,掌控着部门工作的政策制定权和资源分配权,依靠职能部门办学的现象比较突出,学术权力参与学校管理的空间有限。同时,无论是学校还是对有关职能部门来说,“唱赞歌可以,找问题不行”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能客观和科学地对待院校研究工作,给院校研究造成阻碍,不利于院校研究的开展。

第三,院校研究的日常化和制度化不够。院校研究是学校自我研究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制度,是学校管理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美国大学中

的院校研究是大学制度内部规定的一个环节,院校研究机构一般都是常设机构,工作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很强。我国高校目前的院校研究工作总体上还处在应急和临时状态,缺乏制度化和制度保障。学校有制定规划、迎接评估、工作汇报、经验交流、筹办校庆等临时性任务时,院校研究才会临时受到重视。由于经常性和制度化不够,院校研究机构和人员在完成这些临时任务时,一是本身有临时思想,二是对学校的情况在资料、数据、思想、理念等基本素材上掌握不够、把握不准,影响了任务完成的质量。所以,促进院校研究的日常化和制度化,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四,有些院校的的领导不重视院校研究。院校研究本质上是院校的自我行动和自我研究,是学校行为。院校研究能否开展或者开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校领导是否重视。事实也证明,得到学校领导重视,院校研究开展得就好。但是,目前还有一些院校领导没有真正认识到院校研究的价值和作用,不太重视院校研究。他们认为自己在校工作几十年,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学校的发展已经有宏伟蓝图和清晰思路,没有必要再搞院校研究。而且院校管理中的具体情况经常变化,临时性问题很多,灵活性很强,院校研究人员难以把握。这表明,目前我们很多大学都还是习惯于个人决策和经验决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与我们院校领导的产生方式和缺乏问责有关。

第五,院校研究数据库建设比较困难。院校数据库是开展院校研究的基础,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学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持,是院校研究的基本特征,是院校研究科学性的重要表现。但是,目前我国的院校研究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院校数据库,不少院校的基础数据统计口径不一、数据项目不全、数据公开性不够、准确性有待提高,院校缺乏统一和权威的数据汇总机构,数据分散在有关职能部门,也还存在有几套数据的现象。因此,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促使各院校建立具有统一统计口径的、准确的院校数据库,是院校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述问题,主要与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和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有关,是现行大学制度的产物。只要相应的大学制度做出改变,这些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院校研究就一定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并在院校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未来发展来看,院校研究有着广阔前景。目前,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趋势是不能违背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已不可能走

回头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下放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解决大学的行政化运行问题,并将“进行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作为今后十年教育领域十大改革试点之一,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研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等具体要求和任务。这些涉及的都是大学治理中关键的体制和机制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完成,一个大学自主办学、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市场决定院校生死的完全竞争时代必然到来。院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成为关系院校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院校研究就会由外部推动变为院校更加自觉的行为,成为增强办学竞争力和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自觉要求,成为每一个院校必须开展的不可或缺的工作。院校研究不仅必要,而且是院校所

需。院校研究一定有着美好未来。

(本文根据作者 2011 年 8 月 8 日在东京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在成稿过程中,参考了刘献君教授的诸多思想和观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胡振敏. 院校研究的起源、发展与现状[J].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2,(2);马福(John A. Muffo). 美国院校研究概述[J].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4,(2);程星,周川. 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 [2] 刘献君. 论院校研究中的若干关系[J]. 高等教育研究,2009,(2):42-48.
- [3]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研究十年回顾[J]. 高等教育研究,2010,(9):41-48.

(本文责任编辑 骆四铭)

• 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

近代英国博雅教育及其古典渊源

北京大学博士生 沈文钦

导师 陈洪捷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2008 年

20 世纪 40、5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分别从教育哲学、学术史、教育史(包括教育思想史)的维度对博雅教育进行了大量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以大量教育思想史原典、英语辞典、学者文集为基础,重点选择若干代表人物的经典文本,以思想史的关键人物为线索,以语义分析为基础,用概念史的方法,从“理想人格和知识挑选”的角度,勾勒博雅教育从亚里士多德到纽曼的“概念变迁”和思想流变。

第一章以亚里士多德为个案,分别探讨了其著作中的自由人(eleutheros)和适合于自由人的知识(eleutherion epistemon)这两个关键概念。第二章研究了西塞罗和塞涅卡对 artes liberales 的论述。第三章研究了中世纪七艺典律的形成和拓展,探讨了中世纪理解 artes liberales 的若干维度。第四章从理想人格与知识挑选的视角出发,研究乔治·特恩布尔、约瑟夫·普莱斯特里和维塞斯莫·诺克斯三者的博雅教育理论,探讨了文雅观念对 18 世纪博雅教育思想的影响。第五章对其博雅教育理论进行详尽深入的思想史研究;力图通过对纽曼教育思想中“博雅”知识、绅士、理智培育、心灵教育等关键观念的剖析,把握纽曼的写作意图,提炼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命题。第六章简述了博雅教育思想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20 世纪之前,liberal arts(或 liberal sciences,liberal studies)其本质含义是“符合自由人身份的知识”或“符合绅士身份的知识”,liberal education 的本质含义是“自由人的教育”或“绅士的教育”。18、19 世纪的英国,liberal 具有两层最基本的语义维度:1. 符合绅士身份的、绅士般的、高贵的、高雅的;2. 博学的、丰富的、广博的、通识性的。Liberal education 概念一方面反映了古典教育的“雅俗”分野,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古典教育“尚博”、“尚通”的基本精神。博雅教育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自由人知识”(eleutherion epistemon)和古罗马“自由人技艺”(artes liberales),在中世纪演变为“七艺”,17 世纪之后,在英国与绅士观念合流,演变为近代“博雅”教育学说。

18、19 世纪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均强调“博”与“雅”两个维度。首先,18 世纪的博雅教育深受文雅观念(politeness)的影响,以社会——道德为指向,在 19 世纪,心智训练取代了“文雅”观念的地位;其次,在 19 世纪,通识教育 and 专业教育间的矛盾开始突显,liberal 的语义重心从“雅”(高雅的,符合绅士身份的)转向“通”。这两大区别背后是“文雅社会”向“才智社会”的转型。18 世纪的文雅知识概念见证了科学知识和人文学科的分离,反映了文雅观念对博雅教育思想的影响;19 世纪流行的 general education 概念则表明通识教育 and 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成为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主要矛盾;20 世纪,liberal education 等同于 liberating education、general education,它和绅士阶层之间的联系寿终正寝,其制度含义也发生革命性变化——从大学本科教育变成大学本科教育中“通识”部分(不超过全部课程的二分之一)的教育;经过自由、民主、平等原则的改造,liberal education 以通识教育的身份生存下来。